

伦理学影响下文学中的伦理身份

——以《泰尔耶·维根》为例

胡朝霞, 奉 辉^①

(南华大学 外语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第一个属于本土的文学批评方法。该研究方法跨学科地将文学和伦理学相结合,强调伦理身份在文学文本分析过程中的过程和作用,既契合了当下对身份研究的热潮,又迎合了文学文化研究的伦理学转向这一特征。文章试图以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泰尔耶·维根》为例,揭示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对文学文本分析的适用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 文学伦理学; 伦理身份; 《泰尔耶·维根》

[中图分类号] I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3)05-0116-05

伦理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关于道德的科学,亦称道德学、道德哲学或道德科学。它将道德现象从人类的实际活动中抽分开来,探讨道德的本质、起源和发展、道德水平同物质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道德的最高原则和道德评价的标准、道德规范体系、道德的教育和修养、人生的意义、人的价值、生活态度等问题。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童话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20世纪文学开始出现伦理转向,“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的产生最初完全是为了伦理和道德的目的。”^[1] 聂珍钊教授于2004年首创文学伦理学批评,“一种从伦理的立场解读、分析和阐释文学作品、研究作家以及与文学有关问题的研究方法,它认为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2] 文学伦理学批判的本质就是“以比较文学的方法,将伦理学与文学两个不同的学科进行比较研究”^[3]。本文尝试以《泰尔耶·维根》为例挖掘伦理学如何通过伦理身份与文学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伦理身份不仅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术语,更是伦理学中的一个概念。小说通过其中所塑造的伦理身份的变化向读者提出了如何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泰尔耶·维根》是易卜生创作的长诗之一,主要叙述了维根的成长经历。主人公在大海上漂泊多年后回乡娶妻生子,过着简单而幸福的生活。不久英丹战争爆发,为了生存他冒险出海寻找食物,结果被捕入狱。五年牢狱之后,他发现妻女饿死,无家可归,失去了作为父亲和丈夫的伦理身份,人生理想幻灭。多年后,他在同一海域遇上了当年的仇人和他的妻女,经过爱与恨、善与恶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选择了善,拯救了仇人一家,也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善与恶作为伦理学中一对基本的范畴,产生于自利性的基础上,互相依存、相互对立。“善”使维根为家庭铤而走险,结果失去了家庭、失去了为父为夫的伦理身份;随着故事的发展,善又使他放弃国仇家恨,重获了“为父为夫”的伦理身份。救赎了敌人也救赎了自己的灵魂。维根伦理身份的变迁和转换记录了挪威人的民族精神和身份在历史上的经历和遭遇。他的善象征着挪威人的善,心怀良善,宽厚容忍,这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和伦理道德观念对诗人和维根的影响使然。

一 平静生活:四重伦理身份

伦理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以及社会中存在的伦理关系及道德秩序。伦理身份就是个体作为行为主体与社会或他人之间存在的伦理规范上的关系。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面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伦理学概念,认为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

[收稿日期] 2013-09-16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2013年一般项目“二十世纪美国文学中的医学伦理研究”资助(编号:13C834)

[作者简介] 胡朝霞(1972-),女,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①湖南省衡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助理研究员。

身份相关。因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重点置于对人物伦理身份的分析。伦理身份也成为伦理学与文学所交汇的关节点。在具体的运用中,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伦理身份,伦理节和伦理线的问题。伦理身份就是在伦理线上不停地滑动,最后形成了故事。《泰尔耶·维根》的诗歌中的同名主人公维根建构了四重伦理身份。第一种伦理身份是人子的身份。从小他桀骜不驯,远离父母四处闯荡。父母的双亡只让他“神情忧郁了五六天”之后又投入“广阔的大海”。因为大海对挪威人民生活的重要性,因此大海相对于挪威人来说就具有了大海母亲的伦理身份,而维根作为挪威人也象征性地具有了大海之子的第二重伦理身份。历史上挪威人一直把自己视为从大海里发展起来的民族,挪威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挪威人对大海的独特感情。挪威三面环海,海岸线长达2.1万公里,境内多山,高原、山地、冰川占了绝大部分的面积,耕地面积只占国土的3%,特殊的地理环境注定了他们要以海为家,注定要搏风击浪,用生命荡桨在海洋中漂流一生。同时大海是挪威人的衣食父母,是他们的生活来源,给他们提供食物。因而大海又可被视为“母亲”。尤其是1807—1814年英丹战争爆发的时候,英国军舰切断了挪威的所有海上商路。挪威的大部分粮食是从海上输入,再加上1809年挪威农业歉收,挪威陷入饥荒。维根与女儿安娜之间的关系是他拥有的第三重伦理身份,即父亲的身份。人父的身份慰藉了他在大海中失去的自由。家庭关系是一种具有自然特性的伦理关系,要求其中成员必须承担责任和义务。从此他常常守着摇篮唱起最好的歌曲,或者“常常整天整天地操劳不休,晚上就在小女儿身旁打坐。”^{①46}作为人夫是他的第四重伦理身份。在出海一年后他娶了妻子,常常怀着爱看着温柔的妻子不停纺织,感到了家庭的快乐和幸福,“整个冬天他都过得十分幸福,守着他亲爱的安乐窝。”^{①45}但是这种情感同样锁不住他对大海之友之母的向往,他再一次选择与大海进行交流。

维根承担着大海之子、人之子、安娜之父和娇妻之夫这四重伦理身份,伦理身份传递出个体所应遵循的伦理道德、责任和义务。在四重伦理关系中,维根最看重与女儿安娜之间的父女关系,以及和大海之子之和友的关系。父性又成为父亲身份的第一职责,“父性,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化机制,是生殖与有意识抚养行为的结合。它的出现意味着作为生殖者不仅要提供给后人存活下去的事物,更重要的是将知识和文化传递给后代。”^[4]因为这样一种父亲

的伦理身份,维根承担着各种伦理关系中最重要 的关系——父子关系。在成为他人的儿子和丈夫的伦理身份并不能挽留住维根远去的脚步,唯独女儿安娜可爱的面孔能够留住维根,并使他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去搜寻粮食。并且这样一种伦理身份也促使维根产生博爱之心,最终拯救了英国军官一家。父子之间的伦理身份和伦理关系成为作者所关注的重点。伦理身份预示着人的一生的所有人际关系。故事通过主人公的四种关系的失落,又通过“博爱”的方式“复得”,向读者揭示了西方伦理道德价值观的意义。随着家庭伦理关系的打破,维根承受着伦理的悲剧。要将悲剧转为喜剧,也同样需要以伦理身份为落脚点。

二 伦理悲剧:三重伦理身份的失去

伦理学的目的是提倡人的价值道德观念,缺乏这种社会所积累的价值道德观念和个体的伦理身份就会产生伦理悲剧。诗人将这篇诗歌描述成伦理悲剧,英国军官的无伦理道德价值,他对于维根妻女的生命,表现出轻蔑和不屑,“他哭——回答他的却是哈哈大笑,笑声恶毒而轻蔑”^{①51},英国强盗道德伦理的丧失导致了维根多种伦理身份的失去,最终产生维根的伦理悲剧。作者创作的目的就是批判英国强盗的无道德性,而颂扬挪威人民的道德性和人性中的“善”。诗人的创作符合伦理学宣扬伦理道德,提高个体伦理道德价值观的目的。

邹建军教授认为,“易卜生是一个时代性很强的诗人,他关心他那个时代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每每将其写进自己的作品里,并且满怀一种热情,从来不隐含自己的观点,这就让其诗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5]《泰尔耶·维根》的情节正是利用了1809年的英丹战争事件。从14世纪起,挪威和丹麦结成联邦的关系,但是始终处于丹麦附属国的地位。19世纪英丹战争中,英国打败丹麦,丹麦不得不割让挪威给瑞典。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诗人塑造的伦理悲剧就体现在家庭伦理身份和公民伦理身份的丧失之中。关于家庭伦理身份即为父为夫的伦理身份丧失。英丹战争之时,挪威面临旱灾,农业欠收。英丹战争中英国封锁大海,导致面临饥荒。为了满足小家庭对食物的需要,承担伦理身份所赋予的伦理责任,维根不得不去违反英国军队的禁令出海寻取食物。维根经过三天三夜的劳作终于得到三袋食物。但在即将抵达家乡时,他被英国的战舰赶上。口粮被铁石心肠的舰长打入大海,他本人被捕后受罚入狱五年。从伦理学的视角来看,他被捕入狱是一个

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伦理灾难,这使诗中人物的伦理身份发生了根本改变。对维根而言,食物就是妻儿的生命,失去了食物就等于让妻儿失去了生命,英国舰长的恶打翻了维根的食物无异于谋杀了维根妻儿的生命,剥夺了他的父亲身份和丈夫身份,以及自由和尊严。牢狱艰难的五年中,他忍受着“不自由的痛苦”,沉默了,失声了,“他又变得不声不响,奇怪地一动不动”^{①152},不再述说他的遭遇。他想,“多少个年头,在监狱里受苦之日,我的心智都已枯干,就像在沙土上被人践踏的树枝。”^{①152}当时挪威处于瑞典的附庸国地位,诗人又年少,“作为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在显示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画面前,感到义愤填膺……他投身于反对瑞典压迫者、争取本民族独立的斗争。”^[6]就公民伦理身份来说,就是公民对祖国像母亲一样的爱护和维护,不甘于祖国母亲挪威遭英国肆意欺凌,“但是你瞧英国三桅舰那么骄傲/竟向祖国海岸开去。”^{①151-152}对于挪威人民来说,大海是祖国的象征,也具有母亲的象征意义。

诗歌中表现的时间也正说明了这起政治事件对诗歌形成的积极意义。诗中表明了战争时间,“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了巨大的纷争/残酷的一八〇九年”^{①147},五年后战争结束,维根作为战俘被遣送回挪威。在诗中五年牢狱之灾隐含着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意味着五年之后的1814年,丹麦战败,挪威与丹麦历经434年的联邦关系结束。在丹麦和敌国之间达成的协议中包括了对挪威极为重要的政治内容,即挪威在瑞典联邦内重新获得独立国家的地位,拥有本国的自由宪法、议会、政府和征税权。因而19世纪英丹战争引发了当时代的挪威文学更强烈地反映出强烈的民族独立诉求。从这个角度来说,易卜生人物的塑造目的就是记录、叙述、反思挪威国家在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历史遭遇。维根的命运和挪威的命运相似,他的入狱象征着整个挪威民族被拘禁、被束缚的命运,丧失了独立的主权,在强势的外族面前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在英国人的凌辱下,维根的沉默暗示着当时挪威在涉及自身命运的决定中处于“失语”的窘境。但维根以沉默来抗争,作为具有强烈民族独立意识的挪威在强盗之间这桩肮脏的交易中像任人宰割的牲口一样,无法发出抗议之声。这正印证了易卜生关于争取民族独立的观念。他认为生活在必须忍受而又认识到无法忍受的矛盾之中,以及被囚禁是人类的命运。光明不仅是人们渴望的也是人们所害怕的。他一直呼吁民族应该通过坚毅、忍让、自助、自立的方式获得民族独立,不要将希望寄予敌人的仁慈和上帝的恩赐。

主人公就怀抱这种观念藏身于这黑暗之中,“逃避生活上的强烈欲求,给自己制造一个与世隔绝的天地,以避免作出抉择的烦恼和良心的痛苦,他们走向生活就是隐遁,躲进个人幻想的堡垒。”^[7]维根在五年牢狱之后采取了遁世的生活。这和当时挪威的具体情形有着吻合的一面,作为附属国,挪威人试图改变,争取民主的独立,但是一直都未果。挪威人民通过不断抗争和努力也终于在民族独立的道路上取得了小小的胜利。

三 虚幻喜剧:三重伦理身份的重获

家庭伦理的丧失导致了悲剧故事的发生,但是重获家庭伦理又造成伦理喜剧。聂教授认为,“文学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为人类提供娱乐,而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警示,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8]文学伦理学在文学创作中,利用了虚构的手法塑造家庭伦理复原之后的喜剧故事。易卜生借助了基督教的“博爱”观念来复原维根所缺失的家庭伦理。耶稣说,不仅要爱那当爱的,不当爱的也要爱。他身体力行,不仅为自己的门徒洗脚,为求他的病人医治按手,并在十字架上为扎他的兵丁祷告开脱罪行。这种基督教精神完全影响了诗人易卜生。同时中国墨子也提倡“兼爱”观念,“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

出狱后,维根失去了妻儿,成了孤家寡人。后来他当上了一名领航员,帮助在大海中迷路的船只驶向安全海域。多年后,当他发现远方海上英国快艇闪着的求助信号,他迅速地驰近,发现原来他准备救助的人正是当初把他置之于死地的英国舰长。他要为死去的妻儿报仇,要履行复仇的伦理义务,就像当初年轻的舰长那样对待他。但就在这时那位年轻的母亲一声“安娜”的呼唤,让维根突然惊醒,让他想起了他的小“安娜”,让他又重获若干年前的家庭伦理身份。此时英国姑娘安娜成为他想象中的自己的安娜,那位妈妈成为他的妻子,英国军官成为他自己。这种为父、为夫的伦理身份使他开始进行了比较,同时他意图迫使勋爵体会他曾经有过的恐怖、绝望的感受和体验。同时,维根也同样以丈夫和父亲的身份去关爱勋爵的“安娜”,这让他重新体验并唤起了心中对于他的小“安娜”的那份深爱 and 关切之情。维根“把孩子的卷发抚弄”,“他心里一阵轻松,他吻了吻小孩子的双手,突然开心地笑了一

声。”^{①58} 维根又重获了父亲的伦理身份。在勋爵对家人无能为力和绝望时, 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出现, 并使他宽恕了英国人的野蛮行为, 他要让小天使依然美丽可爱, 让漂亮的勋爵夫人依然优雅动人。此时他仇人的伦理身份转换成了自己原初的伦理身份, 而英国军官从侵略者转变为一个被救赎者的伦理身份。维根伦理身份的转换宣示着西方人对博爱的基督教精神的主张和宣扬。他的行动是大爱无疆的最好注解, 从他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先哲们的伦理精神, “老吾老及人之老, 幼吾幼及人之幼” 那种高尚情操, 看到了“故天下兼相爱则治, 交相恶则乱”。他的行为和中国孔孟墨之道依稀相仿, 遥相呼应, 这也说明了人性的最根本是向善的。当勋爵及夫人和维根相互摇动着彼此的手时, 他简单、平静地表明了当时的复杂情感, 表示并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放弃了自己的报仇使命。事实上这就是一种博爱的精神。在这之后, 维根重新复活了, 又重获了他所失去的一切伦理身份, 他自言自语说道, “我失去了一切, 一切又回到我的身边, / 如果你, 天哪, 在这里又把我发现, / 谢谢你, 为了这次相逢!”^{①59} 他重获了大海之子的伦理身份, 又快乐地回到大海母亲的怀抱中, 重获大海之子的自由, 开始打鱼了、送鱼了。他成了从前的维根, 虽然一头白发, 却欢愉、强壮、健康、有朝气。他也重获了作为英国安娜的父亲的身份。

伦理学对于影响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调节社会伦理秩序、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以及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对于文学的道德意义来说, 聂珍钊教授更是明确地提出文学的道德意义, “文学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为人类提供娱乐, 而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 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警示, 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 诗歌《泰尔耶·维根》提倡一种向善的意识和歌颂人性善的观念。主人公正是内心深处的向善伦理意识, 以及内心深处所渴望的伦理身份, 维根才会对当年把他置于死地的对手施以援手。善产生的根源正是伦理身份的复归, 尽管这种复归是虚幻的而非真实的。善更多的表现是对人性的克制, 维根的善控制了对杀妻杀子的仇人的愤恨, 用理性战胜了感性, 尽弃前嫌, 化敌为友。康德认为消除、平复痛苦的手段是使有理性的人认为, 人只有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才能消除痛苦。从康德观点的角度看, 维根的价值表现在挽救了一个即将被大海无情毁灭的家庭, 实现了一个领航员的价值; 其次, 他的救助行动帮他摆脱了仇恨的陷阱, 帮他走出了伦理意识迷失的阴影, 重获

了挪威人民自古以来就具有的善良、宽容、向善等伦理品质。他“友好地摇着他们的手, 把孩子的卷发抚弄”, 他说, “我失去了一切, 一切又回到我的身边。”^{①59} 他曾经拥有的“一切”就是他大海之子、安娜之父和娇妻之夫的伦理身份。同时他的义举又重新树立了挪威人民的精神和思想境界, 获得了他人的认同。先前驾驭着英国国旗的快艇的英国勋爵受到维根的感染和影响, 在离开的时候表现出对维根和挪威人的尊敬, “于是快艇升起了挪威的国旗。”^{①59} 这一切都是挪威人和挪威民族向善的伦理意识促成的。

诗中两个小女孩的名字也具有明显的寓意, 都叫“安娜”。“安娜”一词来自希伯来语, 意即优雅、恩惠。这暗示着诗人对两个曾经彼此仇恨的民族的下下一代能相互恩爱、和平共处的期望。两个小孩的同名不仅是故事情节的需要, 更是用来唤醒了维根内心深处的父亲的伦理身份和伦理意识, 也寓含着作者的一种宗教意识。潜藏在心底的父爱伦理意识让他释放了心中的仇恨。海的儿子以海一般的宽阔胸怀接纳了他的敌人, “我如今自由自在! 人活着会变得多么欢畅!”^{①58} 他的血液已不再突突地奔流, 没有了痛苦的复仇的渴望, 人人都是泰尔耶·维根的朋友。

四 结论

伦理身份是伦理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伦理术语, 这个伦理学术语被运用到文学中并成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文学伦理学通常是通过伦理身份的建立和构合而形成喜剧, 而当初的伦理关系破碎, 伦理身份出现断裂和破坏, 文学也就成为悲剧形式。易卜生戏剧中主人公的悲剧正是他的三重伦理身份总受到外界力量的冲击而失去了稳固的人子、人父、人夫的三重伦理身份, 产生了新的伦理困惑, 而一旦虚幻地寻回了以前曾经拥有的伦理身份, 主人公就又回归了平常人的心态和大海之子的伦理身份。故事中伦理身份的变化引发了故事情节的变化和曲折有致, 增添了文学本身的文学性和陌生性。这样文学和伦理学完成了合构的任务。

注释:

① 文中所引用诗歌均来自《易卜生文集》第8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参考文献]

- [1] 聂珍钊. 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J]. 外国文学研究, 2005(1): 8-11.

[2]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 外国文学研究,2010(1): 12-22.

[3] 王 晨. 文学批评的伦理转向:文学伦理学批评[J]. 山东社会科学,2009(5): 50-53.

[4] 蒋天平. 上帝还是恶魔——20 世纪美国黑人小说中的父性[J]. 当代文坛,2008(3): 155-157.

[5] 邹建军. 易卜生诗歌的政治情结[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2009(1): 75-82.

[6] [苏]卢纳查尔斯基. 亨利克·易卜生[M]//高中甫. 易卜生评论集.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260.

[7] [英]J. W 麦克法兰. 亨利克·易卜生[M]//高中甫. 易卜生评论集.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340.

[8]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4.

On the Ethic Identi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With Tai Erye Wiegen as an example

HU Zhao-xia, Feng Fei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s the first of the lo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 this research combines literature and ethics, and stresses the ethical identity and its role in the process of literary text analysis, catering to not only the current hot research on identity, but also the transmission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y to ethics.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do research with Norwegian playwright Henrik Ibsen’s “Tai Erye Wiegen” as an example, demonstrating the feasibility and applicabilit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n literary text.

Key word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 identity; Tai Erye Wiegen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创新之路

马妮在《社会科学辑刊》2013 年第 3 期撰文指出,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观昭示我们,当代的中国文化创新是在对传统文化真正认识的基础上对当代文化环境和发展方向的探索。要实现文化创新,就必须葆有文化反思的思维意识,在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交流与融汇中寻求文化发展空间。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所面临的文化问题错综复杂,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问题、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西学化渐问题等等交织在一起,这种情况极大地增添了我们进行文化创新的难度。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时时做到对当前文化的自省与反思,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克服文化创新过程中所遇到的重重阻碍。当前,探讨全球化语境之下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三种文化的融会贯通之道,以积极乐观的心态为新文化的诞生创造条件,就显得极为重要。这种由三种文化的思想精华凝练而成的新文化也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并非朝夕可成之事,但它承载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梦想,代表着具有充分文化反思意识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